

漢代的「塞」和後方的重點

勞 幹

對於古代的邊防建築，被注意的是長城。但就古代來說，長城只是「塞」的一種。因為「塞」要包括了防禦工事以及防禦設施，就防禦工事來說，牆垣當然是其中最重要的，不過不一定都是牆垣，有時還利用天然的形勢，做成種種的阻隔。這在漢書匈奴傳中侯應對答邊事一段話中，說的相當清楚。我們對於漢簡中所說到的塞，就各種資料對照來看，就可以做更深的了解。其次，既然構成了「塞」，塞就是一套組織，除去前方的工事以外，還包括塞上各點的交通，以及前方對於後方的聯絡和通訊方式。這些在邊郡中是從太守都尉以下的候官，候長，燾長三級分層管理。這是比照太守民政方面的組織來設施的，太守以下，有丞（比照都尉），有縣令長（相當於候官），鄉嗇夫（相當於候長）和亭長（相當於燾長）來管理也是從丞以下再分三級。所不同的，只是在鄉以下還有亭和里不同的兩組，里是戶口的單位，亭是距離的單位，亭長是吏員，里魁（在官方稱為里正）卻不算吏員。雖然戶口記錄用里做標準，而里卻還是一個自治而非官治的單位。從以上的比照，候官，候長，燾長，是和塞有直接關係，但亭這一組織，負責治安，還是武職，並且從京師到邊塞的大道上，仍有烽燧。大道上是十里一亭（這個里是指距離上的長度），所以內地的亭仍和邊塞的傳訊，有密切的關係。

「塞」或者可稱為長城，是一條長數千里的防線。一般人的印象，以為和普通城郭的城一樣，在數千里中都可以分兵據守，如其敵人來攻，就可以憑這一條長城，不讓敵人進來，實際上並不是這樣的簡單。《漢書》九十四〈匈奴傳〉下，元帝時，呼韓邪單于上書願保塞，請罷吏卒以休人民。天子令下有司議。議者皆以為便。郎中侯應習邊事，以為不可許。上問狀，應曰：

起塞以來，百有餘年，非皆以土垣也。或因山巖石，木柴僵落，谿谷水門。稍稍平之，卒徒築治，功費久遠，不可勝計。臣恐議者，不深慮其終始，欲以壹切省繇戍。十年之外，百歲之內，卒有它變，障塞破壞，亭隧滅絕，當更發屯繕治。累世之功，不可卒復。（藝文補注本 1815 頁）

這是很清楚的說明漢代的「塞」，雖然以土城為主要部分，但也不限於以城垣為塞，有時還採用天然的形勢，來阻止胡馬的南侵。在居延和敦煌的烽燧，兩處我都去過，居延是以前方轉播訊息為主，是縱深的排列，敦煌北邊烽燧卻是以防衛南下的胡騎

爲主，是橫闊的排列¹。只看敦煌一系列的烽燧，也就是緣「塞」排列的。爲了易於說明，現在引用《斯坦因西域考古記》成段來做證明²。

這一直線一直向東邊三哩左右的一座碉樓伸去，其形式明明白白是橫過低地的一道城牆。略爲搜檢，便顯出我是真的立在一道邊牆的遺址上面。我把一薄層流沙清除之後，就看見了用葦桿紮在一定的間隔，同泥層交互，砌成一道正規的城牆。全部經過鹽滲透之後，堅固異常。牆的外面，同內部成紮的葦桿成直角形。還放有別的葦桿，紮的很仔細，形如束柴，砌成隄形，葦桿束一致長八呎，厚約八吋。這種奇形怪狀仔細而堅固的牆，本身對於年代並不能有確定的端倪可尋。幸而有很好的機會，鼓起我找尋必要的年代證據。（按，從附近發現的漢簡年代，已確實證明爲漢代的。）（譯文本第 119-120 頁）

當我更轉向東方尋找的時候，我居然又能遇到一道邊牆和碉樓……那一道邊牆大約有十六哩左右的距離，實際上絲毫沒有間斷。邊牆位於低高地光石子地面上，比沖積地高得多。在有低沙丘處戛然中斷。過此便是保存很好的邊牆。厚達八呎，兩邊實際上一無損傷，聳立的高度仍達七呎以上。建築方法的特別，在此處很容易研究。蘆柴和相間的泥層，因爲此地土壤和水中含有鹽質，已成爲半化石狀態。（譯文本 121-122 頁）

仔細利用各種自然形態，並細心的適用地利，這是古代計畫建造守勢城牆時候最注重之點，我們考查到城牆西段證明中斷以後，是可以充分表明了。……解釋起來，就是在長城轉角處，到達疏勒河大終點盆地的極東北角上，這裏延展

1 《漢書》九十四〈匈奴傳〉上「武帝卽位……漢使馬邑人聶翁壹，開關出物，與匈奴交易，陽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。……單于信之，而貪馬邑財物，廼以十萬騎入武州塞。單于既入漢塞，未至馬邑百餘里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，怪之，乃攻亭。」（藝文本1602頁）這就是說匈奴入塞，並不一定攻亭，往往是越亭前行的。這種行動也是不難了解的。因爲亭燧沿著邊塞或大路，一個接一個。其中人數和物資並沒有多少，但亭燧建築相當堅固，而防衛系統相當完整。如其一個一個的攻下去，那就要消耗很多的實力，尤其要耽擱上幾倍的時間，給漢兵一個充分準備的機會。在戰略上是非常不合算的。匈奴大軍如其攻任何一個亭燧，一定可以攻下。但是事實上不可能每一個亭燧都會被攻，所以在匈奴大軍後方的亭燧，還可以做觀察和報警的任務。在居延簡中如同：「虜守亭鄣，不得燔積薪。晝舉亭上燵一煙，夜舉離合苣火，次亭燔積薪，如品約」（1434；六十九頁）。所謂虜守亭鄣，就是指被匈奴人包圍而未進的亭鄣。也就是匈奴人準備進攻的不是這個亭鄣（如其正在被攻，就無法報訊了。）但是亭鄣以外的匈奴人並未退走，所以還要一方面據守，一方面報訊。

2 《斯坦因西域考古記》（Max Aurel Stein: On Ancient Central Asian Tracks, 向達譯，中華書局 1936 年出版）此書關於敦煌部分係其大著 *Sevindia* 的節要。可以對有些問題看出一個大致來。

出約三百方哩。地面上沼澤縱橫，一年中大部分時候極難通過。這對於騎兵的襲擊可以作有效的防禦。……所以古長城即止於此。（譯文本 125 頁）

所以依照現存的遺址，就可以確實證明，漢代的邊塞並非如同明代的邊牆，一直用城垣連續不斷的接下去，即使前方有一個難以逾越的山川沼澤，在這難以逾越險阻的後面也要修築一道城垣。漢代的塞卻就不一定是這樣，從〈匈奴傳〉中侯應的奏對，再來看斯坦因的考察，兩種不同的資料確實相符。所以現在要糾正這一個普遍的設想，認為漢代的「塞」全部是用城垣築成的。

但從另外一個角度去看，斯坦因的設想也有不符漢代當時實際情形之處。斯坦因僅據遺物的現象，卻未曾參考到任何文獻的資料。他的結論當然應該是一段一段不相接的城垣，在兩段城垣的缺處，是利用天然形勢來阻隔內外，其中並不一定需要人為的工事。但若依照侯應奏答中的原意，卻是北邊的塞，依然連續不斷，橫貫著幾千里。其中大部分是城垣，但在若干特殊地形裏面，卻是利用一些木柴籬落，以及其他方法連接成為一線。所以在敦煌的疏勒河澤地後面，雖然沒有堅固的城垣，卻應當還有木籬一類的工事。這一類非泥土石塊建造的工事，在澤地的後面，時間久了，也就視天然的力量所破壞，以致沒有存留下來，卻不見得就是本來沒有。

在漢簡中我們看到的是只用「塞」這一個名稱，卻從來不用「長城」字樣的。關於長城，是從戰國以來常見的名稱，和漢代通用的「塞」字，是有些些區別的。就性質來說，長城是塞的一種，並不能完全代表塞。為的是「塞」指所有的工事，如同侯應所說的，按照地形，有種種不同的設置。長城卻是專指土石或人造磚所砌的牆垣。兩者有不小的差異或特定的範圍。也就是說，長城是塞的一種，塞的種類很多，不僅僅的只限於修建長城。

長城這種形式的防禦，應當在戰國時開始，在春秋時代當找不出線索。《左傳》僖公四年：「楚國方城以為城，漢水以為池，雖眾無所用之。」這是說利用方城山作為城來防禦，和後來狐偃對晉文公所說「表裏山河，必無害也」同意，並非在方城山有任何築城的情事。後來楚國在方城山所築的長城，應當春秋晚期或戰國初年，晉國獨霸直到韓魏始強，對楚威脅，楚國才開始築這道工事，不應當在春秋時代早期。其次是魏國西方的長城，其地方大致在陝西北部，從渭河入口處向西北伸張。應當是在

戰國初年，魏文侯和魏武侯的時期，爲了擴充疆域，修築了長城去偪秦。到了魏惠王時代，魏國失掉了黃河以西的地方（西元前三四〇年），秦和魏又和從前一樣，以黃河爲界，這道長城就失掉功用。至於泰山中的齊長城，山西南方是魯國，魯國並不是可以威脅齊國的。有到了春秋晚期，在中國沿海地方，最先是吳國開始增強國力，形成東方的霸主，接著又是越國代替了吳國，在沿海一帶構成了對齊國的威脅。尤其是越王句踐曾在瑯琊建立了國都，這對齊國的影響是相當沉重的。等到越王句踐死後，越國勢力就此衰落，但是楚國在東方的力量，又繼續增強。一直到了戰國時代，楚國的「下東國」反而成爲楚國的重鎮。楚國滅魯時間甚晚，可是楚國的勢力，仍構成了齊國的威脅。所以在春秋晚期到戰國初期，也可能就是齊長城的建造時代。這是所謂「長城鉅防，足以爲塞」的。漢代的「塞」雖然在正式名稱上，並不叫做長城，但因爲具有長城的形式，在一般人口中，仍把它叫做長城的。

《漢書》〈高帝紀〉，二年，「繕治河上塞。」這是漢代初次在記載上出現的。這裏的塞字，指的是國防工事是沒有問題的。只是這一處「河上塞」究竟在什麼地方，就有了問題，因而這一次「繕治」（意思是將舊有的塞，重新修理好，再行使用。）所依據的舊塞，也就發生了時代問題。據《史記》卷六，〈秦始皇本紀〉，三十二年，說：「西北斥逐匈奴，自榆中並河以東，屬之陰山，以爲三十四縣，城河上爲塞。又使蒙恬渡河，取高闕、陰山，北假中，築亭障以逐戎人，徙謫實之初縣。」這裏所說，是相當複雜，並且意思也不十分明確的。依照《史記》所說，我們只能看過以後，了解一個大致。假若要認真的核對起來，就不免有許多不能解答的問題。所謂「城河上以爲塞」，是說，在這一處的「塞」，它的位置是緣河的，它的形式的築了一道長城。這是後來所通認的「秦始皇築長城」的一個主要部分。但就此一段看起來，仍有說的不夠清楚的感覺。據《漢書》九十四上〈匈奴傳〉：

晉悼公使魏絳和戎翟，戎翟朝晉。後百有餘年，趙襄子詘句注而破之，並代呂臨胡貉。後與韓魏共滅知伯，分晉地而有之，則趙有代、句注、呂北，而魏有西河、上郡，呂與戎界邊。其後義渠之戎，築城郭呂自守，而秦稍蠶食之。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。惠王伐魏，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。秦昭王時……遂起兵伐滅義渠，於是秦有隴西、北地、上郡，築長城呂距胡。而趙武靈王亦變

俗胡服，習騎射，北破林胡樓煩，自代並陰山下，至高闕爲塞，而置雲中、雁門、代郡。……燕亦築長城，自造陽至襄平，置上谷、漁陽、右北平、遼西、遼東郡，以距胡。……其後……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³，北擊胡，悉收河南地，因河爲塞，築四十四縣，城臨河，徙謫戍以充之。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。因邊山險，墾谿谷，可繕者繕之，起臨洮，至遼東萬餘里。又度河據陽山北段中。……十有餘年而蒙恬死，諸侯畔秦，中國擾亂，諸秦所徙謫邊者皆復去，於是匈奴得寬，復稍度河南，與中國界於故塞。（《漢書》藝文本 1596-1597 頁，又《史記》藝文本卷一百一十 1179-1181 頁與此略同，現在因爲《漢書》敘述其他雜事較少，文字較簡，所以在這裏引《漢書》。）

又據《史記》卷八十八〈蒙恬傳〉：

秦已並天下，乃使蒙恬將三十萬眾，北逐戎狄，收河南，築長城，因地形用險制塞，起臨洮至遼東，延袤萬餘里。於是渡河至陽山，逶蛇而北。（《史記》藝文影殿本 1039 頁。）

根據以上的材料，秦的北塞，實際有三項不同的經過。也就是：(1) 是戰國時期秦國所築的塞，包括有隴西、北地和上郡的邊界。這時趙國也擴張了西北方面的邊塞，是「自代並陰山下，至高闕爲塞」所包括的有雲中、雁門和代郡。再往東去就是燕國的邊塞，包括有上谷、漁陽、右北平、遼東和遼西郡。(2) 到秦始皇三十三年時，派遣蒙恬去伐匈奴，以後就大規模的築塞，並且把舊的長城連接起來。「因邊山險，墾谿谷，可繕者繕之。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。」把這一些舊塞連成一線很長的工事，這就形成秦始皇修築長城的故事。(3) 所謂「萬里長城」如同上一節所說的，只能算一個主要的「塞」，但是除去這一個主「塞」以外，還可以有一些附屬的塞。我們專看文獻，當然不夠清楚。如其用漢代烽燧的遺址來觀察，那就在主要工事線以外，也就是「塞外」，還可以有重要工事的修建。在額濟納河遺址之中，主要邊塞，係到「肩水金關」爲止。這道關口是到塞外一定要經過的道路。但居延縣城以及居延都尉城都在肩水金關以外，並且還有許多成系統的障和亭障。同樣理由，我們也可以決定一直在

3 這個字藝文本據王先謙補注根據宋景祐本作「物」是一個錯字，《史記》作「象」，殿本《漢書》也是作「象」，按〈秦始皇本紀〉，這件事是在秦始皇三十三年。

爭論的玉門關問題。玉門關本在敦煌以東，和玉門縣同在一處，沒有任何同名異地的理由。等到敦煌郡建立以後，爲了敦煌的重要性，才將關都尉移到敦煌西面，並且最早時期，這個關都尉還是酒泉的關都尉，並未收歸敦煌郡管。假如追溯到敦煌建郡時期，敦煌郡實際上在玉門關外。再追溯到還未建敦煌郡的時期敦煌縣及其他障塞也在玉門關外。所以邊塞只是「工事」，並不代表邊界，這種主要工事的外邊，還可以有任何建制的。所以秦始皇所建的主要工事（也就是「塞」或所謂「長城」），是應當在黃河主流以南設置，並且利用了黃河的險阻，在工事以前方來遮斷胡騎。但在河套區域，黃河早已經分成了許多支流，這也要叫做黃河，這些支流以南，應當是水草豐美的地方，所以叫做「河南地」，實際上卻在沿河布防的主要工事以北。這就形成了解釋上的歧義，使得正確的地形圖不容易畫出來。以現有史料來分析，應當是秦代的主要塞上工事，是在現在黃河主流以南，拿黃河來守險。黃河主流以北到黃河支流以南，是秦漢時代的「河南地」。在黃河支流以北到陰山以南，是當時所謂「北假中」。只有這樣分配，才可以講得通，否則就不免混亂了。現在再綜合敘述一下，河套一帶地方，首先是趙武靈王開關的，到了秦滅趙，黃河主流以北地方似乎又失去了，秦始皇首次置塞，也只能以黃河主流以南來臨河置塞。等到蒙恬收復河南地，再以陰山高關爲塞。不過高關的塞只是外圍的塞，其黃河以南的舊塞，並不廢棄。到了漢高帝時重修「河上塞」也還是秦時原有的工事。直到漢武帝使衛青收河南地，置朔方郡，然後又再使用了陰山的塞，當成了北邊的重要工事。

因爲這是一種相當複雜的經過，也就使做史學工作的人，難以弄的十分清楚。《史記》卷八〈漢高帝本紀〉：

二年，漢王東臨地，塞王欣，翟王翳，河南王申陽，皆降，韓王昌不聽，使韓信擊破之。於是置隴西，北地⁴，上郡，渭南，河上，中地郡，關外置河南郡，

4 《漢書》卷一〈高帝紀〉（藝文本 41 頁）：「二年，十一月，使諸將略地，拔隴西。……繕治河上塞。……春正月，……諸將拔北地，虜雍王弟章平。」未言置北地郡在什麼時候。若參考史地，那就這一年開始，已置北地郡，只是此時才全部收復北地郡。北地郡濱河，隴西郡却不濱河。所以繕治河上塞應在拔北地郡以後才對，因爲《史記》中未曾記上拔北地郡一件事，《漢書》是幾種史料拼湊成的，不免安置上有錯誤。如將此段記載放後一些，就沒有問題了。

更立韓太尉信爲韓王，諸將以萬人，若一郡降者，封萬戶，繕治河上塞。（藝文影殿本《史記》171 頁）

《史記索隱》：

晉灼曰，〈晁錯傳〉，秦時北攻胡築河上塞。（《漢書》〈高帝紀〉注，師古曰，繕補也。）

殿本考證，齊召南曰：

河上塞卽河上郡之北境，與匈奴邊界處。非秦時蒙恬所取河南地，因河爲塞者也。蓋自諸侯叛秦，匈奴復稍度河，南與中國界於故塞。〈匈奴傳〉可證也。河上郡後爲馮翊，前卽塞王國。此時初得其地，卽復繕治耳。晉灼注以遠在朔方五原解之，非也。

齊召南的考證多數是精確可信的，不過這條考證卻有嚴重的誤解。左馮翊曾命名爲「河上郡」是因爲東濱黃河，在它的北面並不濱黃河。今陝北地區，是屬於上郡，不在「河上郡」範圍以內。漢代在今陝北地區設治，只有雕陰縣（鄜縣或稱富縣），高奴縣（延安）和膚施縣（綏德）幾個重要的據點，許多地方都是荒涼而空曠的。所以從延安、綏德，到榆林的那條主要大道，也就並未開闢。秦漢時代從西安向北的大道，是從雲陽（今涇陽縣以北，三原縣以西），向西北經慶陽到寧夏，然後再到河套。也就是雲陽是對北方防禦的起點，卻在中地郡（右扶風）而不在河上郡（左馮翊）。因此「河上郡」的河上，和「河上塞」的河上，並非一個地方。「河上塞」也就是蒙恬未收復河南地以前的秦時故塞。晉灼說的很不清楚，當然對此了解不夠，齊召南以爲在左馮翊，那就變成毫不相干了。

對於前方工事的維持，當然不是那樣簡單的。和「塞」有互相依賴，互相供給，互相照應的關係的，就塞的本身來說，有「塞」的各種工事，有城和障，還有塞上的亭（也就是特別稱作「戍」的）。爲了軍事支援和後方補給，也一定有修築完工的道路。這些道路，都是在寬度和坡度能適合於馬車和牛車通過的。在這些主要的道路沿線要經常的維護和管理，這就形成了郵驛的設施。並且在郵驛的工作上，還兼上傳遞公文和準備傳事的任務。在主要道路的沿線上，因爲有從京師對邊方聯絡的需要，漢代烽火臺的設置也是沿著幾條主要的道路的。在本文以前曾經提到，秦漢的雲陽是京

師對北邊的一個主要通信中心。這也就證明了長安對北邊的主要道路，是從右扶風開始由西北轉北，經慶陽和寧夏直連河套，而非經延安、綏德和榆林北上的。所以後來衛青的主力，也是走的是這條路。這是因為從淳化、慶陽、西北行經過黃河的河谷，雖然比走榆林稍遠一些，但沿途平坦，水源供給充裕，比較走陝西北部，自有其便利的方面。這樣看來，不僅衛青的北伐匈奴走的是這條路線，向前去追溯，蒙恬的北伐匈奴，也是走的是這條路線，衛青走的還是從秦朝以來，已經經營過的舊時道路。

從《漢書》上每次大舉的軍事行動來看，也可以表示出來幾條主要的邊塞道路。如同文帝六年：

六年冬，匈奴三萬騎入上郡，三萬騎入雲中。以中大夫令免為車騎將軍，屯飛狐（按飛狐口，在今河北省易縣西北，漢屬代郡。）故楚相蘇意為將軍，屯句注（在今雁門關附近。）將軍張武屯北地（郡治馬領在今甘肅環縣）。河內太守周亞夫為將軍，次細柳（注眼處曰在長安北部。）宗正劉禮為將軍，次霸上（按當在長安東霸水傍。）祝茲侯徐厲為將軍，次棘門（注如淳曰三輔黃圖，棘門在長安橫門外也。）以備胡。

其中所用的字，「屯」和「次」是不一樣的。屯是卒軍屯戍，是前方，「次」是領軍等待出發。屯戍的兵已達到前方，「次」的兵只在長安附近。所以據《漢書》〈周亞夫傳〉，文帝親自勞軍，只到了長安附近的兵營，並未到遠處去。再看這一次的屯兵，一共三處，屯飛狐的兵，是在河北省的西北部，正當今山西大同一帶到河北省平原的路（這裏可以證明當時雖然已有居庸關，可是居庸關的道路稍偏東些，為丁運輸便捷，所經的道路卻是從定興、涞水、易縣，到飛狐口的道路。）句注所在即是雁門關，後來為從太原到大同的主線，只是近來的鐵路線是經寧武關而不經雁門關，這是因為坡度不同，對於鐵路還是經寧武關便利些。再次是北地這是長安西出雲陽的大道，也正是漢代對北邊正式驛道及烽燧所通過的地方。到了唐代以後的驛道所經，應當是延綏一帶，不再以雲陽驛道為唯一的主道了。

到了武帝時期曾經有許多次的出師，在《漢書》〈武帝紀〉見到的，如同：

（元光六年）匈奴入上谷，殺略吏民。遣車騎將軍衛青出上谷，騎將軍公孫敖出代，輕車將軍公孫賀出雲中，驍騎將軍李廣出雁門。

（元朔元年）遣將軍衛青出雁門，將軍李息出代。

（元朔二年）匈奴入上谷、漁陽，殺略吏民千餘人。遣將軍衛青，李息出雲中，至高闕，遂西至符離……收河南地，置朔方、五原郡。

（元朔五年）大將軍衛青將軍兵十餘萬人，出朔方、高闕。

元朔六年，春二月，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兵十餘萬騎，出定襄，……還，休士馬於定襄、雲中、雁門（與〈衛青傳〉相同）。

（元狩二年）將軍去病⁵，公孫敖出北地二千餘里，過居延。……遣衛尉張騫，郎中令李廣皆出右北平。……秋匈奴昆邪王殺休屠王，並將其眾，合四萬餘人來降，置五屬國以處之，以其地爲武威，酒泉郡。

（元狩四年）大將軍衛青將四將軍出定襄，將軍去病出代，各將五萬騎，步兵踵軍後數十萬人，青至幕北，圍單于……至闐顏山迺還；去病與左賢王戰，……封狼居胥山，迺還。

元鼎六年，……又遣浮沮將軍公孫賀出九原，匈奴將軍趙破奴出令居，皆二千餘里，不見虜而還。

元封元年，冬十月詔曰：「南越東甌咸伏其辜，西蠻北夷，頗未輯睦。朕將巡邊垂，擇兵振旅。射乘武節，置十二部將軍，親帥師焉。」行自雲陽，北歷上郡、西河、五原，出長城，北登單于臺，至朔方，臨北河，勒兵十八萬騎，旌旗徑千餘里。……匈奴讐焉。

元封四年，冬十月，行幸雍，祠五畤，通回中道（應劭曰：回中在安定高平，有險阻，蕭關在其北，通治，至長安也。）遂北出蕭關，歷獨鹿、鳴澤。（注眼處曰，獨鹿山名也，鳴澤澤名，皆在涿郡遼縣北界也。補注，《方輿紀要》，獨鹿山在涿州西十五里，下有鳴澤。）自代而還。幸河東。

太初元年，……夏五月，……遣因杼將軍公孫敖，築塞外受降城。（補注胡三省云，受降城在居延北。）

太初二年，……秋，……遣浞稽將軍趙破奴二萬騎出朔方擊匈奴，不還。

5 按〈霍去病傳〉，是元狩二年春出隴西。

太初三年，……夏四月，……遣光祿勳徐自爲築五原塞外列城。西北至盧朐，游擊將軍韓說，將兵屯之。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。秋匈奴入定襄雲中，殺略數千人，行壞光祿諸亭障（注師古曰，漢制，每塞要處，別築爲城，置人鎮守，謂之候城，此卽鄣也。）⁶

（天漢二年）……夏五月，貳師將軍三萬騎出酒泉與右賢王戰於天山，斬首虜萬餘級，又遣因杆將軍出西河（補注，敖與強弩都尉會涿邪山，亡所得。）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，出居延，北與單于戰，斬首萬餘級，陵兵敗，降匈奴。

天漢四年，春正月……發天下七科謫，及勇敢士，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六萬騎，步兵七萬人，出朔方，因杆將軍公孫敖萬騎，步兵三萬人，出雁門。游擊將軍韓說，步兵三萬人出五原。彊弩都尉路博德，步兵萬餘人，與貳師會。廣利與單于戰余吾水上（補注，通鑑胡注，余吾水在朔方北。）連日，敖與左賢王戰，不利，皆引還。

征和三年，……匈奴入五原，酒泉，殺兩都尉。三月，遣貳師將軍廣利將七萬人出五原。御史大夫商丘成二萬人出西河。重合侯馬通四萬騎出酒泉。成至浚稽山與虜戰，多斬首。通至天山，虜引去，因降車師，皆引兵還。廣利敗，降匈奴。《漢書》五十五〈霍去病傳〉（藝文本 1158 頁），元狩三年春（〈武帝紀〉作元狩二年，是，這裏把二誤作三），爲票騎將軍，將萬騎，出隴西有功。……轉戰六日，過馬支山，千有餘里，蹙泉蘭下。……其夏與合騎敖，俱出北地，異道，博望侯張騫，郎中令李廣，俱出右北平，異道。……而去病出北地，遂深入……去病至祁連山，……濟居延，遂臻小月氏，……揚或乎觥得（後爲張掖郡治）。

以上是據《漢書》〈武帝紀〉中屢次出師的材料，以下再用《漢書》〈匈奴傳〉所記的來比較。又《漢書》九十四，〈匈奴傳〉（上）說（藝文本 1601）

6 戰國時代鄣塞制度已經用在邊境的戰國策魏策一（四部備要本卷22第5頁）「卒戍四方，守亭障。」又西周策二（卷1第5頁）「秦悉塞外之兵」這裏用法與漢代相同，又蘇秦稱秦和齊都是「四塞之國」，所謂四塞，也就是天然的防禦工事。所以齊國也是「四塞」，這是戰國時塞字的用法。

孝文十四年，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，蕭關。殺北地都尉印，虜人民畜產甚多。遂至彭陽，使騎兵入燒回中宮，候騎至雍，甘泉。於是文帝以中尉周舍，郎中令張武爲將軍，發車千乘，十萬騎，軍長安旁以備胡寇。而拜昌侯盧卿爲上郡將軍，窳侯魏遼爲北地將軍，隆盧侯周竈爲隴西將軍，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，成侯，董赤爲將軍，大發車騎往擊胡，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，即還。……軍臣單于立歲餘，匈奴復絕和親。大入上郡，雲中，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，於是漢使三將軍，軍屯北地，代屯句注，趙屯飛狐口。……又置三將軍，軍長安西細柳，渭北棘門，霸上以備胡。胡騎入代句注邊，燧火通於甘泉，長安。數月漢兵至邊，匈奴亦遠塞，漢兵亦罷。

武帝即位……匈奴絕和親，攻當路塞。……然匈奴貪尙樂關市者漢財物，漢亦通關市不絕目中。

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騎出雁門，李息出代郡擊胡，……明年，衛青復出雲中呂西，至隴西，擊胡之樓煩，白羊王於河南，得胡首虜數千，羊百餘萬，於是漢遂取河南地，築朔方，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，因河而爲固，……是歲元朔二年也。

前將軍翕侯趙信，兵不利降匈奴。……單于既得翕侯，目爲自次王，用其姊妻之，與謀漢。信教單于益北絕幕，目誘罷漢兵，微極而取之。毋近塞，單于從之。其明年（王先謙曰，元狩元年夏），胡數萬騎入上谷，殺數百人。明年春，漢使票騎將軍去病，將萬騎，出隴西，過焉耆山千餘里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，得休屠王祭天金人（沈欽韓曰，地理志，左馮翊，雲陽縣，有休屠金人祠及經路神祠。……此因霍去病得休屠金人，置諸雲陽，郊祀志，作甘泉宮以致天神，是也。）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，北地二千里，過居延攻祁連山。……其秋……昆邪，休屠王恐，謀降漢，漢使票騎將軍迎之，昆邪王殺休屠王，並將其眾降漢，凡四萬餘人，號十萬。

……明年春（元狩四年）……漢謀目爲翕侯信爲單于計，居幕北，目爲漢兵不能至，乃粟馬，發十萬騎，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，糧重不與焉。令大將軍青，票騎將軍去病中分兵，大將軍出定襄，票騎將軍出代，咸約絕幕擊匈奴。……

是後匈奴遠遁，而幕南無王庭。漢度河自朔方呂西至令居，往往通渠置田官，吏卒五六萬人，稍蠶食地接匈奴目北。初漢兩將大出，圍單于，所殺虜八九萬，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，漢馬死者十餘萬匹，匈奴雖病遠去，而漢馬亦軍少，無呂復往。……會票騎將軍去病死（王先謙曰元狩六年），於是漢久不北擊胡。

（太初二年）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……匈奴八萬騎圍之……生得浞野侯……軍遂沒於匈奴……，……太初三年……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，遠者千里築城障，列亭至盧朐，而使游擊將軍韓說，長平侯衛伉屯其旁，使強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。

（元鳳三年）是時漢邊郡薰火候望精明，匈奴爲邊寇者少利，希復犯塞。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，將二萬騎出遼東，匈奴聞漢兵，引去。

宣帝卽位，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，昆彌願發國半，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，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。本始二年，漢大發關東輕銳士，選郡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者皆從軍。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出西河。度遼將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，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，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，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。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，出塞各二千餘里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，昆彌自將翕侯目下五萬餘騎從西方入，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眾。……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谷蠡庭，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目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、牛、軍、驢、羸橐駝七十餘萬，漢封惠爲長羅侯。

以上所徵引的，是以《漢書》本紀爲主，〈匈奴傳〉只是補充的材料，不能用來詳引。當然在本紀中頗有脫漏的地方。如同宣帝本始二年，五將軍出塞北征匈奴，這是一件大事，但出塞的地點，在本紀中卻不曾記上，只有根據〈匈奴傳〉才知道。這也是〈匈奴傳〉必需作爲一個主要參考的。

現在將北邊各郡，和大軍出塞的年份，列表在下面，作爲比較

漢代的「塞」和後方的重點

郡名	敦煌	酒泉	張掖 (附居延)	武威	金城
年代	×	本始二年	本始二年 太初二年 天漢二年	×	×
郡名	隴西	安定	北地	五原	朔方
年代	元狩二年	×	文六年 元封元年	元鼎六年 征和三年	元朔五年 太初二年
郡名	上郡	西河	代郡	定襄	雁門
年代	×	本始二年	文六年 元光六年 元朔元年 元狩四年	元朔六年 元狩四年	文六年 元光六年 元朔元年
郡名	上谷	右北平	漁陽	遼西	遼東
年代	元光六年	元狩二年	×	×	元鳳三年

以上從漢文帝時到漢宣帝時，出塞大舉的路線，可以看出前進的方向，還是很明顯的受到後方補給的影響。所以在這方面的路線，大致分為三組，每一組可以代表一個特殊區域，而這些區域，是從補給方面的路線來決定的。以下就是這三個不一樣的道路的分布：

第一個補給線，是距離秦漢京都，咸陽或長安，最具威脅的路線。也就是大致相當於長安正北的路線。對於人力和物力的補給，以及通信設備的重點，並不是在長安，而是長安以北約二百里的雲陽。這是因為雲陽正當向北大道的入口，可以控制這條大道，在那裏加上軍事設施，可以免去京師的紛擾，而且還可以作為京師外線防禦的中心。正因為雲陽是長安的外圍，當建都長安的時候，雲陽是京師的主要門戶，等到建都洛陽的時候，雲陽雖然還有其重要性，但比較西漢時代差的多了。也就是東漢移都城到洛陽使得對於西北邊防，有了很大的退步。

第二個補給線，是從長安向西，直通西域，這是一條很長的線，也就是著名的「絲道」，在補給的路線中，應當是以「上邽」為重點。上邽也就在現今的天水市。因為主要的補給站，應當在前方和後方交會之所。接近後方，為的是易於送到，也易於存儲，接近前方，因為比較上容易轉運到前線。以上所說的雲陽，是在京師以北，

平原和山谷交會之區，也正當北方的大道。在西方大道之上，當著六盤山以南，直通六盤山以西的廣大地區，只有上邽（即天水市），具有存儲轉運兩便的條件上。而且就漢代以來所存的大城裏面，上邽要算最大的一個（蘭州市發展較後，在漢代初建金城郡時，也遠比上邽為晚。）所以在此要討論上邽的地位。

第三個補給線，是要追溯到漢代對北方出兵，是分爲趙和代兩支北上的，趙國這一支，可以說是從河北省境內北上的路；代國這一支，可以說是從山西省北上的路。但就補給來說，趙國決不是僅以中山、常山、真定等處爲限，而代國也決不是僅以太原、河東爲限。就敦煌漢簡及居延漢簡來看，補給的事項，都不是以當地小區域爲限，是地方性的；而是以全國都有負擔，是全國性的。所以不論是趙或者代，彼此都有一個共同的大後方，也就是趙和代同樣的是以關東地區爲大後方。關中地區的給養也要靠關東地區的漕運，而關東地區的北方防禦，卻只受關西地區中央政府的指揮，並不接受關西地區的支援。因此在關東地區就一定要有一個軍事補給的總匯。當然也許不止只有一個，但其中最重要的一個，依據現有的史料來分析，應當屬於魏郡的黎陽（在現在河南濬縣境內）。

首先要討論的，就是長安附近「雲陽」這一處後方重點。依照《史記》和《漢書》的記述，談到開闢北方道路，以及匈奴的軍事威脅以及對於匈奴的防禦，也都提到了雲陽，可見雲陽是一個重要防務中心。

關於雲陽的重要性，顧祖禹《讀史方輿紀要》卷五十三涇陽縣下，曾有考證，說：

甘泉山，縣西北百二十里，周迴六十里。……甘泉出焉。……登者必自車箱阪而上。阪在雲陽縣西北三十八里縈紆曲折，單軌財通。上阪即平原宏敞，樓觀相望，范曄說秦王，北有甘泉，谷口之固，即甘泉山也。漢七年，帝幸甘泉，以備匈奴。文帝三年，匈奴入北地，屠河南爲寇，帝初幸甘泉。十四年，匈奴入蕭關至彭陽，候騎至雍，甘泉。後六年，匈奴入上郡，雲中，烽火通於甘泉。《長安輿地志》，甘泉山有宮，秦始皇作林光宮，周匝十餘里。漢武帝元封二年，於林光宮旁作甘泉宮，自是屬幸焉……百官皆有邸舍……。帝以五月避暑，八月始歸。其地最高，去長安三百里，望見長安堞。……元朔五年，復

立泰畤於甘泉，時亦謂之雲陽宮。《漢紀》太初元年，朝諸侯，受計於甘泉，仍諸侯邸，是也。後往往朝會於此，宣帝亦數幸焉，甘露三年幸甘泉，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。黃龍初，匈奴復朝甘泉。元帝亦數幸甘泉。後漢時漸廢。西魏時復修治。後周主邕如雲陽宮。唐貞觀二十年，幸漢故甘泉宮是也。《漢書音義》⁷，匈奴祭天處，在雲陽甘泉山下，秦奪其地。徙休屠王於右地，故雲陽有休屠金人。

顧祖禹這一段有關「雲陽」的，考證甚為詳瞻。只可惜他漏掉《漢書》〈匈奴傳〉那一條：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，北擊胡，悉收河南地，因河為塞，築四十四縣城，臨河徙謫戍以充之，而通其道自九原至雲陽。」（《漢書》九十四上，藝文本 1597 頁）。漏掉了這一條，那就會顯示著，雲陽存在上的意義，只是秦漢皇家的避暑用的離宮別館。並不表示雲陽這個據點，有任何國防上以及交通上有許多重要的關聯。實際上我們可以從各方面看出來，雲陽不僅是一個避暑離宮，同時也是國防上一個重要的支援據點，並且也是和匈奴人在文化上溝通的場所。

再就長安以西方面的交通線來說。這一區所謂道路，也就是故秦國所領有範圍以內的道路。除去雲陽為秦始皇新開的道路以外，就要算到隴西的上邽。雲陽在秦時已經作成了重點，漢代當然一仍秦時舊的設計。這是在六盤山以東，通到北方邊塞的大道。至於六盤山以西那是從現今的隴海鐵路線向西直達的。也就是著名的「絲道」所經過的路線。這條路線，其重點在上邽，是因為上邽不論是屬於隴西，或者屬於天水，是長安以西的一個大城，那是不成問題的。漢代著名的人，如上官桀、趙充國、段會宗都是上邽人。就表示惟其大縣，所以也就有大族。上邽這個城據《水經注》〈渭水注〉：

渭水出縣西北邽山，翼帶眾流，南屈逕上邽縣故城西側城南。出舊天水郡治，五城相接。

7 《漢書音義》這一段是錯的。《漢書》〈霍去病傳〉稱獲休屠王祭天金人，雖以這座祭天金人，第一，是漢武帝時霍去病所獲得，並不是秦始皇時代的事。第二，霍去病所獲的祭天金人，是在河西取得的，後來移到甘泉，並不是一直在甘泉，不過因為是在匈奴大道上，一個重要據點，所以選擇這裏。

這個五城相連的上邽城，也就是現今的天水縣城，至少從元魏時酈道元作《水經注》時已經完成了這個城的形式，一千多年一直未變。到民國三十年才不幸被拆除。在拆除的當時，我恰好經過天水，看到被毀了一部分的城牆。看的非常清楚，這五個城牆，是在不同的時期建造成功的。其中主要的城是在從東向西數第二個城，城是四方形，大約是每邊一公里⁸，在水天縣的五個城，只有這個城是一個四方都有牆垣的城，其東的一個城，只有北、東、南三面，西面是接著這個城的。在西面的三個城，卻是一個接一個，都只有北、西、南三面，在東面是連續的接下去的。這就表明了這個城建造的時候很早，一次再一次的向西擴展，到了北魏時已經成了這種形式，一直維持到現代。

隴西是秦的舊郡，上邽是隴西郡內最大的城，在秦時應當即是郡治。《漢書》四十〈周勃傳〉「圍章邯發丘，破之；西擊益己軍，破之，攻上邽，東守峽關。」這表示當時的上邽是秦時的大縣，也就應當已是隴西的郡治。所以在周勃向西進兵的時候，以上邽為主要目標，若只是一個尋常小縣，也就用不著多說了。如其上邽是一個秦時大縣，而且還非常可能為隴西郡的郡治。那麼五城中主城就可能還是秦時遺跡，歷經漢魏晉和北朝，經歷次延伸，而成為自東望西的連續橫列的形式。這種形成的成功，依照一般都市發展的例證，應當是先沿著主要的道路，沿路發展出建築來，等到居住的人口夠多，需要一條城牆來保護的時候，就發展出城牆來⁹。上邽城所以成為五城相接的特殊形式，顯然是因為交通及貿易上，給這個城帶來了繁榮。而其繁榮的範圍，又正在東西向這一條大道上。經過了一次的調整，建了新城，但城外又繁榮起來，又要築城加以保護。這樣一步一步的推進，前後一共推進了四次，就形成了五城東西一貫的局面。當然，這是不平凡的，除去了國際間具有重要性質的那條絲道上的一個重點，在別的地方，還未曾發現過同樣的事實。這是可以意識到的，漢代的政治、經濟，和軍事的重點，還在長安。上邽的繁榮，是建立在長安的繁榮和長安的對

8 這和現存的武威和張掖城的面積大致相同，可能是根據一個標準來建造的。

9 例如北京的永定門內外部，就因明代時，城南居民聚居曰衆「不可無以圍之」就修起外城城牆來，濟南城外部的城牆，是因為捻匪起來為了保護城南的居民，才築起「圍子」來。這只是擴展城垣的著名例子，但也只擴展了一次。秦州城卻是擴展了四次，足徵有一段很長時期的經濟發展，上限可以到西漢，下限可以到北魏，不曾停止擴張過。

外關係上面。上邽的歷次推進，也就代表以長安爲重點的中央政府對於西方大道具有深遠的關係。

上邽在西漢時屬隴西郡，東漢時改屬漢陽郡（即天水郡改名）。上邽雖然就隴西和水天兩郡來說，是一個規模最大的縣城，而且在東西要道上面，是一個重要商業和運輸的中心。不過就政治結構方面來說，可就不是完全占著領導中心所在的位置的。這可能是西漢對於隴右區域，著重點是開發，東漢對於隴右區域，著重點在防禦。所以郡治所在，往往會移到軍事方面的前進哨，而不是財富或人文會萃的地點。在《漢書》〈地理志〉中，名列第一並非郡治，也有時名列第二的是郡治。其中如左馮翊治在長安城中，高陵卻名列第一，漢中郡治南鄭，西城卻名列第一。漢高帝封漢王都南鄭，東漢漢中郡治也在南鄭，西漢時一度徙至西城。《漢書》〈地理志〉據此一點，也把西城列於第一。至於隴西郡，《漢書》〈地理志〉先列狄道，上邽列在第二。《漢書補注》說：「郡治未詳，《續志》後漢隴西治狄道（今臨洮），上邽改屬漢陽（天水），漢陽的郡治卻在冀（今甘谷），至於東漢涼州的刺史治所，卻在比較上邽西北方的隴縣（今秦安東北），而冀和隴的聯絡中心，還在上邽。這裏也表示隴西和水天兩郡，從西漢到東漢，時有疆域改換的情形，郡治也有時常更換的事實。如其加以解釋，可能是爲了開發邊疆，郡治有移到邊區的政治作用，並不十分著重以境域中最大或最繁榮的城爲郡治。至於東漢刺史治所移到今秦安附近的隴縣，而不在上邽，這也可能由於在東漢建立的時期，占據涼州來割據的隗囂曾以上邽爲都城，光武帝對於地方勢力的膨脹是很敏感的，就此避免以上邽爲刺史治所，改到上邽西北方的隴縣¹⁰。但上邽的繁榮及重要性還是延伸下去。看一看唐代杜甫的「秦州雜詩」，也就看出唐代中葉時期，故上邽城的地理上重要性了。

再次，談到關東後方的補給要點，應當以「黎陽」這個地方爲最合適。黎陽是在漢代的魏郡。就關東地方來說，是「韓魏天下之樞」，相當適中，爲舟車輻輳的所在。黎陽就在漢代的黃河北岸，正當著一個主要渡口，「白馬津」所在的地方。向北沿著太行山，西入井陘（略同今正太線），或者西北到上黨（略同今道清線），就是

10 東漢刺史治隴，也可能是爲了河西四郡的聯絡，所以州治更向西北移些。到了魏晉以後，涼州更遷治武威，一直到後世，武威仍用涼州的稱號。

太原，是雁門和代郡主要的後方；北向常山，也就是雲中、上谷、右北平一帶的主要後方。所以黎陽的兵營和倉庫，應當是關東主要儲存之所。以下《漢書》和《後漢書》中的幾條材料，就充分表示著黎陽的重要性。

《漢書》二十九〈溝洫志〉：（藝文本 871 頁）

哀帝初……待詔賈讓奏……今隄防陜者去水數百步，遠者數里。近黎陽南。……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，民皆居其間。從黎陽北盡魏界，故大隄去河，遠者數十里，內亦數重，此皆前世所排也。（按潁河縣不少，志特著黎陽，此由黎陽亦為治河據點。）

《後漢書》十八〈臧宮傳〉：

（建武）十九年，妖巫維汜弟子單臣、傅鎮等，復妖言相聚入原武城，……遣宮將北軍及黎陽營數千人擊之。

《後漢書》二十三〈竇憲傳〉：

發北軍五校，黎陽，雍營，緣邊十二郡騎士，及羌胡兵出塞。

《後漢書》二十二〈馬武傳〉：

拜武捕虜將軍，以中郎將王豐副，與監軍使者竇固，右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，三輔募士，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。

《後漢書》六十〈馬融傳〉：

按光武省都尉，並其職於太守，以重責任，非弛禁備也。黎陽，雍營，並有重兵，邊郡有將兵長史，當匈奴，羌，胡。及有將軍，校尉，屯營，其軍制可謂嚴整矣。

當東漢廢除州郡兵以後，除去邊郡仍有常備兵仍西漢舊制以外，在內地的大量屯兵，只有北軍五校，以及黎陽營，雍營。雍即今陝西鳳翔，為三輔陵寢所在，所以有重兵駐守。黎陽被選擇上，當然是由黎陽的位置，是舟車大道互相會合的地方，最為便利的原故。這種屯兵東漢初年已經存在，光武向來節省，不多新創，而況屯兵修營，也非一朝一夕可能立致，勢必由西漢時代因仍下來。既有屯兵，也必然的要屯聚給養。兩漢時的黎陽倉庫，雖然找不到積極的證據。但後世在黎陽的倉庫，也是沿襲前代。因而認為兩漢已有倉儲，應是合理的。

關於隋唐在黎陽建立黎陽倉一件事，嚴耕望先生的《唐代交通圖考》第五卷，〈河東河北區，太行東麓南北走廊驛道〉條下，說：

黎陽倉，《隋地志》中，汲郡黎陽縣有倉。同書〈食貨志〉，「開皇三年……詔於蒲，陝，虢，……許，汝等水次十三縣，置運米丁，又於衛州置黎陽倉。陝州置常事倉，華州置廣通倉，轉相灌注，漕關東及汾晉之粟，以給京師。」黎陽爲南北交通之要，又置平儲。故煬帝征遼東，命楊玄感「於黎陽督運。」事見《隋書》七〇〈楊玄感傳〉。《通鑑》一八一，大業七年「七月發江淮以南民夫及船，運黎陽及洛口諸倉米，至涿郡，舳艫相次千餘里。」……《通鑑》一八四義寧元年，「徐世勣言於李密曰，天下大亂，本爲饑饉，今更得黎陽倉，大事濟矣。……開倉恣民就食，浹旬間，得勝兵二十餘萬。」亦證此倉之盛，且爲兵家必爭之地也。……復考《金石萃編》一二一，〈大伾山寺淮勅不停廢記〉，題名有「前黎陽發運使……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孫邨，及鎮遏使，鎮將，知稅，水軍指揮使，□□州倉，寄倉專官等職稱。此石雖後周顯德六年立，然與隋事合觀，知唐世亦置倉，爲發運要地也。惟《通典》，《元和志》，《新唐志》不載倉城。《括地志》似亦未記。惟《寰宇記》五七〈黎陽縣〉目云，「倉城，《冀州圖經》云在州西南，袁紹聚糧之所」，亦不言隋倉在此。（1529-1530 頁）

今按嚴耕望先生所考訂極爲精確。又在注中有關唐代置倉問題說：

《一統志》黎陽倉城條雖引《括地志》，但檢王恢《括地志新輯》與賀次君《括地志新校》皆未見。

這裏是嚴先生客氣了一點，實際上是王氏及賀氏漏輯了《一統志》這一條，而爲嚴先生所發現。本來輯書也如掃落葉，無法一條也不漏，不可以過於責備。但《一統志》這一條非常重要，卻也是事實。《一統志》成於乾隆時期，當時《永樂大典》尙存，官修書如《圖書集成》，《大清一統志》，以至於《淵鑒類函》，《佩文韻府》諸書，其中會有可以輯佚的材料，是不成問題的，所以應當算進去。此外，在以上各條中，爲了和漢代有關，當然，《太平寰宇記》所引《冀州圖經》，言及東漢晚期的倉儲，更可間接證明在兩漢時代，黎陽除去屯兵以外，也曾經有過倉庫的準備，決不可

能有長期屯戍而無儲糧的。如其有儲糧如其當時有若干敦煌大方盤那樣形式的，或者更大的糧倉，那就黎陽的重要性不需懷疑了。

綜合上面的論述，漢代的「塞」是一個牽涉相當龐大的組織，在前方以亭障為主，加上種種防禦的工事，包括長城在內。除去了防守以外，還有通訊系統以及給養系統。在漢簡中表示出來的，已經有許多點可供參考。就前方來說，是以郡為中心，再分到各縣及候官以至於烽燧。就後方來說，還有一個龐大的後勤系統這和幾個重要的道路有密切的關係。據文獻中的顯示，西漢一代對於西方和北方，確有幾個後勤重點，在畿輔的雲陽和雍，在西方的上邽，以及在東方的黎陽，都是屯兵，屯糧中心，也可能還是烽燧交通的中心，這些重點的設施，到東漢時期還有影響存在著。